

中国开放战略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互动^{*}

杨值珍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对外开放是新中国的一贯政策。由于美国对华封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开放成了一种片面、畸形的开放,主要面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外开放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那种片面、畸形的开放难以为继,需要寻找新的开放突破口。与此同时,基于自身利益,美国也希望打开中国的大门,实现中国市场对美国资本的开放。这样,对外开放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终于同步实现。

[关键词] 开放战略; 中美关系; 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0)01-0024-07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中国开放战略的最终形成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也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这两件大事在20世纪70年代末同步完成,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是一面镜子。分析这两件大事的相互关系、探讨中国开放战略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影响,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中美关系,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开放战略、构建和谐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中国的重要盟国,为中国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中国抗战使美国减轻了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保障了盟国“先欧后亚”大战略的实施。事实证明,中美两国的合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

素之一,中美两国合作对于稳定东亚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美国领导人设想使中国成为战后维护东亚和平的主要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实行扶持政策。“罗斯福总统希望中美两国在战时结成的同盟关系在战后继续下去,希望一个统一的、稳定的、亲美的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成为亚洲的主要稳定因素。”^{[1](P1)}但是,美国要支持的中国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美国意识形态中强烈的反共意识,使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极其敌视的态度。美国大力实施扶蒋反共政策,阻止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

面对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既揭露又争取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2](P50)}然而,在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处先后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认清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1946年9月12

*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开放战略与中美关系”(20090450496)的阶段性成果。

日,延安《解放日报》写道,“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因此,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争取美国政策,转而密切与苏联的关系。杜鲁门宣言出台后,中美关系迅速被纳入冷战轨道,美国与中共和解的可能性更小。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3] (P.1472)}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访苏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彻底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美国离间中苏的图谋失败。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进一步固化,美国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和遏制的政策,妄图“使中国彻底孤立于日本和西方世界,以便招致中共政权的被推翻和崩溃”。^{[1] (P.5)}这样,中国就被美国堵在国际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门之外。

然而,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关闭起自己的大门。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后,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政治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承认了新中国,支持中国控诉美国对台湾的侵略,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反对美国片面召开旧金山对日和会。在日内瓦会议、反对美国在世界上制造紧张局势、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关系以及裁军等问题上,中苏两国进行了密切合作。军事上,中苏两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苏联或者确实有困难,或者不愿意为了朝鲜而与美国开战,又不希望因朝鲜问题而影响自己的威望,因而希望中国出兵朝鲜。据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回忆,“斯大林随后说:我们曾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朝鲜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4] (P.783)}。可见,中国出兵朝鲜解开了

苏联的困境。战争期间,苏联也提供了军事援

助,总共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是按半价提供的。^[5]苏联还派出了空军直接参战。经济上,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开展了广泛合作。以中苏为例,1950年,中苏签订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在每年签订年度换货和支付协定时延长一次。1950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3亿美元贷款,并承诺援建50项企业。1953年,苏联答应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煤炭、石油及化学工业、电站、机器制造业、国防工业及其他工业共91项企业。^{[4] (P.800)}1959年,苏联又答应帮助中国建设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制造等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4] (P.887)}中国则向苏联提供了各种原料和农产品,帮助苏联获得了橡胶等战略物资。此外,1955年,中国还应赫鲁晓夫的请求派出了7000名河北青年到西伯利亚协助苏联开发森林。^{[4] (P.809)}科技上,1954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1955年,转交了AK-47自动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提供了现役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1957年,中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据此,苏联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的最早样品,提供了所需的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5]1958年,双方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援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

中国还与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发展了关系。1951年,中国以专笔粮食输出与印度开始重要贸易项目,先后6次签订合同,输出粮食66.65万吨。1952年,中国和锡兰签订了贸易协定、中国向锡兰出口8万吨大米的合同以及橡胶和大米5年贸易协定。1953年,中国与巴基斯坦订立了一项棉花协定和一项煤合同,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贸易协定。1954年,中国与缅甸、印度签订了贸易协定。^{[6] (P.56)}万隆会议以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民族主义国家迅速增加。到1964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民族主义国家共有29个。此外,中国还与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关系。

毋庸置疑,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及民族主义国家的开放对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满足不了中国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对外开放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后。实际上,中国当时既有的开放是建立在世界市场人为分裂的基础之上的,以美国为首、占全球经济绝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没有被纳入中国开放的范畴,因而是畸形的、片面的,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期中国周边国家的快速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这种开放主要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分野基础上的,而且中苏关系一开始就存在强烈的不信任因素和国家利益争端,因而不稳定、不牢固的,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一旦中苏关系出现问题,这种开放就会受到损害。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分歧,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加上中国国内局势的影响,这种畸形、片面的开放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有些建设项目甚至被迫停止。这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开放之路,将目光转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二

中国之所以被堵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政策。正如尼克松指出的,“中国的势力处于国际结构之外。这,一部分是由于它自己的态度以及它忙于解决内部问题,一部分是由于外国的政策,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7] (P.4)}事实上,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绝对禁运”政策。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禁运的决议,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设立中国委员会,制定对中国的特别订单,实施比对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广泛的禁运。到1953年春,有45个国家参加了对中国禁运。朝鲜停战后,1954年,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詹金斯宣称,“在经济方面我们遵循的政策是对共产党中国完全的禁运,我国船只禁止驶往共产党中

国的港口。”^{〔1〕 (P.86)}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像美国那样严格实行对华禁运,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动作。因此,中国要实施全方位的开放战略,就必须首先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1972年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迈上了正常化的征程。但是,正如尼克松说的,“我们并不幻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20年的敌对情绪将会由于我们到那里进行一周的会谈而完全消除。”^{〔8〕 (P.230)}由于两国间的隔阂根深蒂固,两国间的利益冲突尖锐,加之美国热衷于与苏联搞缓和,中美关系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事实上,美国国内与中国国内对改善中美关系不理解甚至反对的人也仍然比较多。两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相差悬殊,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入了僵局,直到卡特总统上台初期仍未有根本性的改观。^{〔9〕}这种状况对于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准备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中国来说是不利的。由于两国还没有完成正式建交,两国关系依然缺乏制度保障,中美关系的大门虽然已经开启,但随时可能被关闭,中国对美开放的战略也可能受阻,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也可能被打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决心通过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来实现开放战略的重心转移,实现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兴工业不断崛起,世界经济联系愈益密切,经历了长期动乱的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和富余资金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1978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发展经济列为国家的首要任务。11—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拥有最先进的科技和最雄厚的资金。从现代化建设角度看,中国需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因此,在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这确实是个大局。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一方面在酝酿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另一方面在商讨中美建交谈判,而邓小平本人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中美建交谈判问题上。11月2

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4] (P.378)} 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集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开会,主要由邓小平通报常委会正在考虑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就与中美建交谈判有关。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想同美国在明年1月1日达成建交协议”。^{[10] (P.291)} 这充分表明中美建交对中国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对中国确立开放战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据《世界知识》发文记载,1979年陪同邓小平访美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问邓小平: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11] 显然,中国对引进美国先进技术来加快现代化建设寄予了一定希望。1979年1月5日,邓小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also 说道:“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愿意同科学技术、工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合作。我们愿意采取多种方式,同他们进行合作,其中包括银行贷款、补偿贸易,也包括其他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认为,美国在相当多的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欢迎美国像西欧和日本一样,参与这个竞争。”^{[10] (P.308)} 不久,邓小平在访美前夕会见美国客人时又说道:“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12] (P.109)} 实际上,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对中国开放战略的意义远不止此。中国要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实施开放战略,就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美苏争霸的总态势下,20世纪70年代,中国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苏联不仅在60年代末武装入侵珍宝岛,还在中苏、中蒙边境驻扎重兵,并多次威胁要打击中国的核基地。虽然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是美国实施“三角战略”的目的不仅在于利用中国遏制苏联,而且在于借助苏联牵制中国。尼克松访

华后,美国仍然把苏联放在第一位,热衷于与苏联搞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停滞不前。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不仅仅担心苏联的威胁,而且更加担心美苏合伙威胁中国。1973年基辛格访华时,毛泽东就表达了这方面的忧虑。1974年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又说,“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我讲的主要是美国的舆论。”^{[1] (P.603)} 事实上,卡特上任伊始就致电勃列日涅夫要“在互惠、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同苏联改善关系”,国务卿万斯也力主美苏缓和。因此,如果不能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中国党政领导集体就难以放心大胆地实施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开放战略也难以顺利推行。

因此,中国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策略。据有关人员回忆,在建交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卡住了,美国坚持不让步。最后邓小平提出,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因为有了这句话,才有后来的“八一七公报”。^{[13] (P.220-221)} 中国还利用贸易问题来促使美国与中国建交。在与布热津斯基晤谈后不久,邓小平就对意大利交通海运部长维·科隆博说:“中美两国贸易方面、人员往来方面还是要发展的。我们明白地告诉他们,关系正常化与不正常化不同。我们不排除美国愿意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是,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优先考虑同我们关系正常化的国家。”^{[10] (P.282)} 事实上,由于中国采取了柔中有刚的策略,美国厂商在竞争中国市场方面远不能与欧洲、日本厂商相提并论。1972年到1978年,中国与欧共体的贸易额从近24亿美元增至32.84亿美元;1972年到1979年,中日贸易额从11亿美元增加到67亿美元。^[14] 1978年,中美贸易额仅有114770万美元。^{[15] (P.224)} 显然,这种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美国大企业家对卡特政府在中美建交问题上徘徊不前普遍不满,要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赖斯顿指出的,“在中国开始同日本、德国、英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进行大量贸易之后,许多美国大企业家,其中大多数是共和党

人,极力要求同北京建立正常关系,使美国有较好的机会及早进入中国市场。^{〔1〕〔19〕}

三

美国对华长期封锁禁运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给美国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这与美国的商业主义传统是相矛盾的。美国脱胎于重商主义和商业资本,追逐海外经济利益、夺取海外市场是美国推行扩张外交的动力。1898年以后,美国全力进行海外扩张,以建立不同于旧殖民体系的门户开放式的商业帝国,即非正式帝国,而建立非正式帝国的核心是争夺中国市场。促使中国门户开放是美国对华的一贯政策。但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冷战开始后,美国被逐步挤出中国市场,丧失了一百多年来其先辈们在华孜孜开拓的成果。1948年,美国对华出口总值为2.734亿美元,1949年为0.826亿美元,1950年1—8月份为0.33亿美元。^{〔1〕〔P.72〕}美国对华全面禁运后,中美贸易实际上中断了。

美国退从中国市场为其他国家开拓或者恢复中国市场提供了条件。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成为中国市场的最大卖主。1950年,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2.4%,1951年达到52.9%,1952年增到72%,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中苏贸易1950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8%,1955年达到56.9%。^{〔1〕〔P.78〕}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也不顾美国阻扰,大力开拓中国市场。据美国海军部门的情报,1950年7月1日到1951年11月30日,共有330艘非社会主义国家船只与中国开展贸易,其中167艘是英国注册的或为英国所有,总吨位超过100万吨。^{〔1〕〔P.79〕}1952年,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等访华,与南汉宸签订《中日贸易协议》规定双方从协议签订日起的7个月内以易货方式各出口3000万英镑。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进一步拓展。1961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签订了谷物购买协议。1963—1966年,中国与西

欧、日本签订了2亿多美元的合作。^{〔13〕}尼克松访华后,除美国外的西方大国纷纷与中国建交,美国更难以与它们竞争中国市场。可见,美国要重返中国市场就必须打开中国对美的大门。正如托马斯1964年给助理国务卿邦迪的备忘录提出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往正在越来越迅速地增加,美国必须设法改变仅仅是遏制的对华政策,逐步打开同中国交往的大门。

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也需要中国变得强大起来,以便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霸权。中国革命胜利之际,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经济关系来保障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和传教事业,在中苏关系中打入楔子;另一方面,美国又担心这会加强新中国政权。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提出,美国应当通过恢复对华“一般经济关系”主要是贸易关系来加深中苏矛盾,导致最终出现一个“独立的中共政权”,但是要严格管制对华贸易。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中苏由盟友逐渐变成敌人,苏联与美国在全球争夺霸权,一场新的外交大改组隐隐出现。基辛格指出,“美国的核优势正在消失”,“冷战以来被认为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阵营出现了严重的裂痕,美国外交的新机遇出现了。^{〔17〕〔P.703-704〕}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尼克松和基辛格从现实主义出发,借助中国遏制苏联。尼克松指出:“我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是今天使我们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但是这些利益在使我们在1972年走到一起方面没有起任何作用”,“真正的原因是在我们在反对苏联称霸亚洲方面的共同战略利益。^{〔18〕〔P.504〕}面对美苏争霸中苏联的进攻态势,美国现在并不害怕中国强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国强大。尼克松访华期间一再表白,中国保持独立、强大、不被瓜分符合美国的利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1978年布热津斯基访华时也说,一个安全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10〕〔P.278〕}这就解开了美国发展对华经济关系会有助于“加强新中国政权”的疙瘩。相反,美国希望中国实施开放战略,通过加强对外经济关系来增加遏制苏联扩

张的能力。

美国战略家们还认为,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历史经验表明,由于沟通机制缺乏,一些国家间纠纷往往会因认知错误而导致战争,从而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对此,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美关系有着沉痛的教训。尼克松指出:“二十年来,我们两国隔着一条敌视和猜疑的鸿沟彼此冷眼相看。这就肯定造成了误解。经常有作出错误估计的危险。缔造持久和平也成为不可能的了。”^{[7] (P.26)}事实上,在遭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 20 年禁运后,中共政权并没有像美国预计的那样垮台,而是变得更加巩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也不断扩大,成为决定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长期游离于国际机制之外会增加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尼克松指出,“如果一个主要的大国置身于世界秩序之外,并且对此怀有敌意,那就不可能有稳定的世界秩序。”^{[7] (P.5)}如果中国实行开放战略,积极主动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就会增加国际秩序的稳定因素。因此,美国“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希望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作用”^{[19] (P.298)},“因为这有利于我们的根本的国家目的。”^{[7] (P.37)}值得指出是,美国战略家们还希望通过中国对美开放来推进中国国内民主和自由的发展。美国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国家,希望通过“山巅之城”的召唤将美国的自由民主之花遍播全球。罗伯特·迪万指出:“美国人已经滋长了一种对中国的浪漫式的想象,把它想象成美国商品、美国文化和美国民主的广阔的潜在市场。”^{[20] (P.25)}美国认为,经济自由会促进政治自由,自由贸易是传播自由制度的重要方式之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既与美国进行经济贸易又能拒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于国门之外。通过贸易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大家庭是美国的梦想。早在美国建国之初,杰斐逊就主张通过贸易把中国纳入“自由帝国”范畴,即实行共和与自治的帝国。^{[19] (P.19)}因此,在放宽对华交往时,美国一般怀有促进中国政治变化的目的。肯

尼迪遇刺后,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西尔斯基曼发表了经肯尼迪审阅过的长篇讲话说:“对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能够促进我国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变化,不把门关起来。”^{[21] (P.335-337)}作为“和平演变”战略的总设计师,尼克松也深知打开中国大门的政治意义。他说:“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18] (P.492)}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卡特也没有忘记劝告中国“允许不受限制的散发《圣经》和让人民有做礼拜的自由。”^{[18] (P.435)}

可见,对外开放是新中国的一贯政策。由于国际形势的制约,中国不同时期开放的对象和重点不同。尼克松访华启动了我国开放由主要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到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由主要面向欠发达国家到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转型过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经过长期折冲樽俎,中美最后做出了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1978年12月16日,中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会议作出了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月,中国国务院发布38号文件,提出把深圳建设成为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境城市。深圳很快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中国面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战略最终形成。因此,中国开放战略的形成与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中国开放战略的形成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完成保证中国开放战略的顺利确立。但是,中国开放战略不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完成的最主要因素,双方共同战略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中美经贸摩擦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仅仅依靠中国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似不足以保障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中美双方必须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不断寻求和拓展双方战略利益的契合点,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2] 毛泽东. 不能停止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批评[A]. 毛泽东外交文选[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 [3]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A]. 毛泽东选集(第4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4] 王泰平. 新中国外交50年[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5] 徐焰. 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J]. 炎黄春秋, 2008(2).
- [6] 谢益显. 折冲与共处——新中国对外关系40年[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7] 尼克松. 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 [8] 李长久, 施鲁佳. 中美关系二百年[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
- [9] 官力. 邓小平与1977年之后的中美关系[J]. 美国研究, 2001(2).
- [10] 石丁. 往事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精彩瞬间[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 [11] 童桐. 改革开放中的美国因素——写在中美建交及邓小平访美30周年之际[J]. 世界知识, 2009(2).
-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谱[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13]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电视台. 邓小平[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 [14] 刘自强.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启动[J]. 理论月刊, 2008(5).
- [15] 石志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16] 张秀阁, 刘凤芹. 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J]. 党史纵横, 2008(8).
- [17]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M]. Simon & Schuster 1994.
- [18] 王根礼, 周天珍. 外国首脑论中国[C]. 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98.
- [19] 李庆余. 美国外交史——从独立战争至2004年[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 [20] Robert Divine. The Illusion of Neutrality[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2.
- [21] 苏格.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 双木)

(上接第19页)

- [10] 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A]. Kegley.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C].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1] Randal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A]. Benjamin Frankel. Realism, Restoration and Renewal[C]. London/Portland: Frank Cass, 1996.

(责任编辑 双木)